

## “名亚迁董”：沈约历史著述的境界<sup>\*</sup>

张 峰

[摘 要] 沈约在兼采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精心撰成《宋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本属名著。然而长期以来，不少论者多诟病沈约曲笔讳饰，而少言其秉笔直书。实际上，沈约著述之旨，在于远追南、董，近效迁、固，撰成一部实录式的《宋书》。撰成“八志”是其重大功绩，他承继前代史家重“通”的编纂理念，于典制记载溯源秦汉，尤详魏晋，弥补了《三国志》、《后汉书》缺载典制的缺陷。沈约对于历史进程的新趋势有着敏锐的洞察，在《宋书》之中，灌注了他对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地位升降、佛教在南朝的传播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张力、南北民族矛盾与融合等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他还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多角度地展现了刘宋一朝历史人物的风貌。正因为有上述多方面的编纂成就，他才被誉为“高才博洽，名亚迁董”的一代良史。

[关键词] 沈约 《宋书》 实录 通识精神 时代风貌 编纂方法

[中图分类号] 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5) 02-0113-06

《宋书》是传统史学名著之一，为南朝梁代史家沈约所撰。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他一生热心政治，于齐任尚书左丞、骠骑司马将军，为太子家令，“特被亲遇，每直入见，影斜方出”。在萧衍建梁的过程中，沈约之功更不可没，以至梁武帝认为他与范云共同成就了自己的帝业。<sup>[1]</sup> 沈约在学术上的造诣备受时人推崇。《梁书》言其早年“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文”，<sup>[2]</sup> 后被誉为“一代词宗”。<sup>[3]</sup> 在史学研究上，沈约博物洽闻，于晋、宋、齐、梁四代之史皆有撰述，所撰《宋书》更成传世之作。

### 一、兼采众家之说，撰成《宋书》定本

沈约文冠群雄，尤善史学，曾担任著作郎，撰次起居注、国史。其史学著述除《宋书》之外，其他均已亡佚。但仅此一书，已足以使其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彪炳千秋。

在沈约编纂《宋书》之前，南朝宋人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等已相继编纂《宋书》。其中，徐爱以何承天、苏宝生编纂的《宋书》为基础，勒为一代之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共计65卷，可谓集《宋书》编纂之大成。徐爱所修《宋书》虽流行于当时，但沈约指出其存在诸多问题，多非实录，难以取信：“至于臧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来，至于禅让，十余

<sup>\*</sup>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演进路径、优良传统和当代价值研究”（09AZS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峰，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陕西 西安，710069）。

年内，阙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sup>[4]</sup>可知徐爱所纂《宋书》至少有如下缺陷：一是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人为孝武帝所仇怨，因而徐爱在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上有失公允。二是自永光以来十余年的史事，徐爱《宋书》阙而未载，难以反映南朝刘宋一代的兴亡。三是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等所修《宋书》，皆属宋人记载宋朝史事，故而著述受到当朝干预，未能直笔，“多非实录”。四是徐爱所修《宋书》史料取舍失当，从而所载史事难以完全取信。

针对徐爱《宋书》存在的种种不足，沈约在兼采众家关于《宋书》编纂成就的基础上，“谨更创立，制成新史”。从齐永明五年（487年）春天，他奉诏修撰《宋书》，“夕惕载怀，忘其寝食”，<sup>[5]</sup>于次年二月完成了纪传部分70卷，随后又耗时多年精心编纂《宋书》诸志，最终刊成《宋书》100卷，流传至今，忝列正史，成为今人研究南朝刘宋历史的基本史料。沈约对于如何编纂一部新《宋书》，有着全局的观念和全面的思考。他首先重新确定了全书记载的范围，“始自义熙肇号，终于昇明三年”，将“非关后代”的晋史人物一并刊除，“归之晋籍”。<sup>[6]</sup>在此基础上，对徐爱所纂《宋书》中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人物传记重加改写，删改因本朝人写本朝事而造成的曲笔讳饰；在史料的取舍上趋于客观，力求对于刘宋历史的撰写达于“实录”。同时，沈约还就徐爱旧本所缺的内容，补撰了自永光以来14年间的史事，从而使得刘宋一代之史臻于完备。

沈约《宋书》撰成后，与徐爱《宋书》并行于世，《隋书·经籍志》对两部《宋书》均有著录，<sup>[7]</sup>但当时人却未有指责沈约抄袭徐爱《宋书》者。由此观之，沈约对于《宋书》的编纂，并非简单地逐录或抄袭徐爱旧本，而是有着更高层次的编纂追求，即效仿南史、董狐、司马迁、班固等良史的编纂旨趣与实录精神，<sup>①</sup>在《宋书》编纂之中灌注自己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深层思考，提高了《宋书》的质量，使之在中古时期产生的多部断代体正史中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因为徐爱的《宋书》已先成，在社会上流通，沈约不会毫无改变的把徐书大部分移植过来，恐怕除孝武帝这一阶段依据徐书外，以前部分还是依据他书。”<sup>[8]</sup>因此可以说，今本《宋书》基本反映了沈约的编纂理念，是我们考察沈约历史观与史学思想的基础。

## 二、承继优良史学传统

实录精神与贯通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而这种优良的史学传统在沈约的历史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承继与发展。

历来研究沈约《宋书》的学者，多非议沈约著述的曲笔。就实践的层面来看，曲笔讳饰绝非《宋书》书法的主流。无论是从其反映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还是记载人物、史事、制度的可靠性，《宋书》都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处于封建皇朝专制统治之下，沈约记事势必有所讳饰，对此不难理解，然而可贵的是，他却能以曲折的办法表达出事情的真相。如《宋书·武帝本纪》记载了晋宋革易之事，称晋恭帝禅位于宋武帝乃“本所甘心”，宋帝刘裕则多次辞让，“于是陈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台群臣，并上表劝进”，而刘裕仍不肯继承帝位，最后，“太史令骆达陈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固请，王乃从之”。<sup>[9]</sup>仅从《武帝本纪》的记载来看，晋宋革易似乎是和平禅让，然观之列传记载恭帝之死，就可以看出刘裕称帝的真相。沈约在《褚叔度列传》中指出，褚秀之与褚淡之为兄弟，秀之妹为晋恭帝皇后，褚氏兄弟虽与“晋氏姻戚，而尽心于高祖”。所以恭帝在位期间，每生一子，刘裕便令褚淡之兄弟将其杀死。恭帝逊位后，居于秣陵宫，刘裕一直密谋暗害，恭帝“常惧见祸，与褚后共止一室，虑有耽毒，自煮食于前。武帝将杀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视后，褚后出别室相见，兵人乃逾垣而入，进药于恭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之”。<sup>[10]</sup>由此列传可知恭帝实为刘裕所杀，证明

<sup>①</sup>沈约在《上宋书表》中言：“臣远愧南、董，近谢迁、固，以阉阎小才，述一代盛典，属辞比事，望古惭良，鞠躬局蹐，靦汗亡庸。”见《宋书》卷100《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8页。

沈约借列传中的记载，苦心地披露出刘宋代晋的历史真相。

在沈约的笔下，最高统治者的愚昧、荒淫昭然若揭。《宋书》记载孝武帝刘骏与其母路淑媛关系暧昧，“于闺房之内，礼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内，故民间喧然，咸有丑声”。<sup>[11]</sup>从《宋书·前废帝本纪》及相关传记资料来看，沈约对前废帝刘子业统治的阴暗面予以了多元视角的揭示：大明八年（464年），自然灾害导致物价上涨，“米一升数百”，以致“饿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因此盗铸，钱转伪小，商货不行”；在个人生活方面，沈约指出前废帝嗜杀成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又纳自己的姑母新蔡公主于后宫，封为刘贵嫔。<sup>[12]</sup>细检《宋书》对于刘宋一朝史事的记载，作者力求从多个面相反映当朝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放荡不羁，毫无讳饰，故而有学者认为，沈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敢于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sup>[13]</sup>沈约在揭露最高统治者荒淫行径的同时，表现出对民生疾苦与经国养民的极大关怀。在《孔灵符传》中，沈氏详载了当时君臣有关山阴湖田的议论，《羊玄保传》收录了吏民亡判罪同伍的辩论，《羊希传》保存了占领山泽以强盗律论的诏疏。这些文献的记载与收录，映衬了沈约对于民众生养之计的重视。不惟如此，沈约还于论赞之中，如实地展现了江南农民耕作之苦及其受到的盘剥：“田家作苦，役难利薄，亘岁从务，无或一日非农，而经税横赋之资，养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于此。穰岁柴贱，柴贱则稼苦。饥年余贵，余贵则商倍。”字里行间透露出沈约对于农民赋税之重、受商贾剥削之苦的同情。<sup>[14]</sup>沈约对此问题的阐发，实已触及社会治理中阶级对立的关系。因而，清代史家王鸣盛据此评价“《宋书》此篇诚为卓然至论”，<sup>[15]</sup>可谓慧眼独具。

自觉追求历史著述的通识精神，是沈约历史编纂思想的又一特色。沈约博才多学，有通识之才，自谓“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后成《晋书》120卷。<sup>[16]</sup>继而又纂成《宋书》100卷。除《晋书》与《宋书》之外，沈约还曾撰有《齐纪》、《高祖纪》（《梁武帝纪》）、《梁新定官品》等史著，可谓以一人之力涉及晋、宋、齐、梁四代之史的撰写。沈约自身修史的经历，已使他对晋代以来以至梁代的历史有着贯通的认识。这种对于历史发展的贯通研究，在《宋书》的编纂中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宋书》“八志”是沈约历史通识思想的集中体现。“八志”共30卷，分别为《律历志》3卷、《礼志》5卷、《乐志》4卷、《天文志》4卷、《符瑞志》3卷、《五行志》5卷、《州郡志》4卷、《百官志》2卷。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莫过于志。”沈约历经多年，著成八篇典志，其编纂之旨是立志弥补陈寿、范曄以来史著的严重缺陷，接续班固、司马彪书志记载的统绪。撰成“八志”，凸显了沈约重视以贯通眼光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过人史识、渊博的学识和不避困难的毅力。这尤其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勾勒了历代典制的因革损益。“八志”对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往往溯源远古至秦汉，尤详于魏晋至刘宋，冀图从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典制的演变。沈约认为，典制的发展“历代损益，每有不同，非务相改，随时之宜故也”。<sup>[17]</sup>因而他对典制发展的梳理，不仅重“通”，而且善于从“通”中求“变”。譬如，《律历志》收录了三国时期杨伟的《景初历》、南朝时期何承天的《元嘉历》和祖冲之的《大明历》。对于这三部历法，沈约不是并列呈现，而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予以编纂。在《律历志》中，他先对杨伟的《景初历》予以载录，进而指出何承天不满杨伟的历法而私撰新历，原因在于《景初历》的记载有失偏颇，“春分日长，秋分日短，差过半刻。寻二分在二至之间，而有长短，因识春分近夏至，故长。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杨伟不悟，即用之”，所以何承天“更建《元嘉历》……以正朔望之日”。<sup>[18]</sup>何氏历法施行后，祖冲之又对何承天的《元嘉历》提出批评：“日月所在，差觉三度。二至晷影，几失一日。五星见伏，至差四旬，留逆进退，或移两宿。分至乖失，则节闰非正。宿度违天，则伺察无准。”<sup>[19]</sup>进而编制了《大明历》。沈约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对魏晋至刘宋时期历法的演变予以考察，揭示出每部新法的制定都是在批评、纠正前代历法不足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在演进路径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关于汉魏以来的舆服之仪，司马彪的《舆服志》与徐广的《车服志》载之较详。但在沈约看来，对于舆服之礼不仅要有所记载，更要将不同时期的舆服之礼加以比较，从中发



现其演变的轨迹。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前人已经载录的舆服之礼，重加叙列，“以通数代典事”。<sup>[20]</sup>同样，在《州郡志》中，沈约记载了汉魏以来州郡的设置及变迁，其间反映了东晋之后侨置郡县的具体情况以及南北人口变化的趋势。沈约的这些记载，颇具匠心，体现了他寓通识思想于断代史书之中的编纂特色。

第二，征引博洽，保存了丰厚的历史文献资料。《宋书》的《礼志》与《乐志》搜罗广泛、内容翔实，是沈约博通思想的又一体现。关于礼志的记载，前人设目不一，沈约对前人所言的礼乐、郊祀、祭祀、礼仪、朝会、舆服等志目总而裁之，在《礼志》中分类记载了冠礼、婚礼、聘享礼、耕籍礼、乡饮酒礼、兵礼、天子巡守礼、冠冕礼、丧礼、祭祠礼以及舆服礼等内容。有学者据此认为该“礼志详博淹赡，胜于《史记·礼书》、《汉书·礼志》多矣”。<sup>[21]</sup>沈约通晓音律之学，因而对于音乐的记载极为丰赡，不仅超越前人，而且后启来者。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曾设置一卷的篇幅记载乐志，然遗漏甚多。有鉴于此，沈约设置四卷的篇幅，载录了东汉以来统治者祭祀天地宗庙的音乐舞蹈、歌词乐章，同时保存了大量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辞赋，兼采乐官、乐工关于音乐的奏疏、议论。这些文献记载大大丰富了《乐志》的内容，因而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宋书》的博洽，还包括沈约重视对前人典制文献的征引，如《州郡志》的编纂，除参阅了班固、司马彪二志之外，还采纳了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续汉郡国》、《太康地志》及地理杂书。这些被征引的典制文献，今已十不存一，更加彰显了《宋书》史料的弥足珍贵。

揆之以《宋书》诸志的记载，可以看出，沈约“从前史书缺有间的实际情况出发，就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上，远溯三代，近及秦汉，详载魏晋以来之事，不但补阙，亦且溯源，备前史之所未备，‘收博洽多闻之益’”。<sup>[22]</sup>体现了沈约对典章制度记载的上下贯通和继承班固以来优良史学传统的苦心。

### 三、重视反映时代风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发展，相较秦汉而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社会结构来说，西晋以来，门阀士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的统治阶层和权力中心，至南朝刘宋时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逐渐式微，而寒门庶族作为一个阶层，已经在社会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文化思潮的演变来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的气象，较为突出的是佛教的发展至为迅速，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二家在斗争中渐趋合流。在民族关系方面，南北朝时期民族之间的战争、融合更为凸显，从而使得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沈约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新趋势，在《宋书》中给予了多维度的反映。

沈约极为重视门阀政治在社会上的作用，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sup>[23]</sup>在《宋书》60卷的列传中，沈约给予了门阀士族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世族地主列传几乎占了一半，仅王、谢二族立传的就近三十人”。<sup>[24]</sup>但是透过《谢晦传》、《谢灵运传》、《恩幸传》等多篇传记的记载，仍不难发现沈约对于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升降关系的思考，这既反映了时代发展的特点，也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刘裕取得天下，虽然主要依靠寒人刘穆之、徐羨之、傅亮等人，但门阀士族王弘、谢晦的辅佐亦功不可没。所以在刘宋王朝初期，门阀士族依然有其势力。譬如，谢晦出身名门，其家族长期为朝中命臣，而谢晦本人也协助刘裕开创天下，后与傅亮、徐羨之废杀少帝而拥立文帝。为求自保，谢晦与徐羨之、傅亮商议：“晦据上流，而檀道济镇广陵，各有强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于中秉权”，<sup>[25]</sup>由此形成朝中、朝外对皇权的控制。但随着文帝皇权的加强，与士族强权之间的矛盾逐渐升级，皇权与门阀士族斗争的结果，导致谢晦以起兵造反之罪被文帝诛杀。沈约通过对谢晦前后命运的揭示，实际暗含了门阀政治权力已开始下降的寓意。在《谢灵运传》中，沈约通过记载这位世家大族谢玄的后代，为我们展现了谢灵运作为门阀士族，希望能够重整家族在社会政治中的威望，但始终不得重用，无奈之余以称疾不朝表达内心的不满，反映了当时社会上门阀士族阶层既希望恢复到可以掌控皇权的时代，而又无力回天的两难境地。实际上，沈约是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折射了门阀士族阶层由盛而衰的现实境况。

沈约一方面勾勒了门阀士族的衰落，另一方面则对寒门庶族的兴起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他除了为刘穆之等寒人单独立传之外，还为寒门庶族设置类传——《恩幸传》，专门记载寒人庶族作为一个阶层的兴

起。在《恩幸传》中，沈约对于这些寒族而被重用者虽然不无微词，但是也洞察了当时寒人掌机要的现状。他指出，宋孝武帝任用寒人戴法兴、巢尚之和戴明宝，“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内外诸杂事，多委明宝”。<sup>[26]</sup> 据此可知，伴随着门阀士族的不被重用，寒门庶族开始成为帝的心腹，逐渐晋升到社会的上层。对此问题的考察，映衬了沈约对当时社会结构变动的观察与思考。

佛教在当时的传播，非常兴盛，以至沈约认为“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焉”。尽管沈约未能突破传统史书编纂的格局，为僧侣设立专门的类传，但是他已看到佛教对刘宋王朝的影响，遂对佛教的记载多散见于纪传之中，其中尤以《天竺迦毗黎国传》记载为详。从沈约的文字中，至少在两个方面反映了佛教在刘宋时期的发展：一是佛教建筑竞相奢靡，铸造佛像耗铜甚众。沈约借助宋文帝时期丹阳尹萧摹之的奏言，指出当时“形像塔寺，所在千所”，僧侣“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夸尚。甲第显宅，于兹殆尽，材竹铜彩，糜损无极”。这些言论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佛教在刘宋发展的兴盛局面。二是佛教的传入与当时的儒家伦理思想产生了矛盾。沈约记载，从东晋的庾冰到桓玄，都主张沙门拜见皇帝，应行跪拜之礼。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年），再次下诏沙门应向皇帝行跪拜之礼，至宋废帝则废除了孝武帝的诏令。<sup>[27]</sup> 跪拜之礼，可谓儒家的基本伦理之一，沈约对佛教传入后与儒家伦理关系之间张力的揭示，反映了佛教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南北朝时期，民族关系极为复杂，《宋书》在反映当时南北民族交融方面，也较为突出。《索虏传》为沈约首创，记载了当时南朝与北魏民族之间的战争、和亲与交流的丰富史实。索虏之称，源于古代北方民族多有发辫，亦称为索头虏，以此为名设立专传，反映了沈约对北魏民族的轻蔑。故而，反映在历史的编纂上，沈约极为重视措辞，如魏使来宋则言“求和”或“贡献”，宋军战败则言“军还”，通过用辞的不同以体现对刘宋作为正统王朝的讳饰。尽管沈约这种为尊者讳的做法，对于反映真实的历史无益，但是沈约在基本史事的记载方面仍然能够做到秉笔直书。观之《索虏传》所载宋与北魏之间的历次交战及其战争的结果，沈约对于刘宋“一举而弃司、兖，再举而丧徐方”的史实并未隐讳，而是如实地记载了双方的胜负，并考察了当时的战争给刘宋王朝带来的破坏。<sup>[28]</sup> 由此我们认为，《索虏传》对于了解当时宋与北魏之间的战和关系、民族交往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 四、开创“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

在历史的舞台上，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然而如何在史书中立体式地反映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与面貌，尤其是对于一些有事迹可载而又不足以立传的历史人物该如何反映在史书的编纂中，实则关乎史家能否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的面貌。相较前代正史，沈约开创了“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一编纂学上的难题。所谓“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即记载某人或某事的过程，因牵涉其他人或事，而为之附带记载，以省去为之重新立传。李慈铭曾指出：“《宋书·蛮夷传》中因西南夷诸国皆事佛，遂及晋以后佛教之盛衰，朝制之崇抑，并传宋世名僧道生、慧琳、慧严、慧议、摩诃衍等，此史家因事附见，其法最善。”<sup>[29]</sup> 从《宋书》的记载来看，“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并不限于《蛮夷传》，在诸多列传中都有体现，值得大力发掘与总结。

《宋书·索虏传》因记载宋魏之战，附带叙述了刘宋大将毛德祖的生平，既避免了为其重新立传造成的史事重复，又使得毛德祖一生事迹卓然可见。在宋魏之战中，毛德祖镇守河南虎牢关。虎牢是北魏占据洛阳的必经之地，虎牢不下，洛阳难取。沈约用大量文字记载毛德祖在镇守虎牢关的过程中，采用各种战术，多次阻退魏军，最终因后援不济、水源缺乏而被魏军所俘。在交代这些史实之后，沈约用一段文字附带追述了毛德祖的籍贯、早期仕晋与宋的经历等内容，从而与前面的史事相互配合，立体式地展现了毛德祖的一生。<sup>[30]</sup> 沈约在《武昌王浑传》中记载武昌王刘浑于孝建元年“自号楚王，号年为永光元年，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得到刘浑的手写檄文后，呈交当时皇上，遂致刘浑先免为庶人，后被迫自杀。在沈约看来，王翼之对于武昌王命运的转折具有关键意义，而王氏一生又无重要事迹可

载，故而在武昌王传之后，附带记载“王翼之字季弼，琅邪临沂人，晋黄门侍郎徽之孙也。官至御史中丞，会稽太守，广州刺史。谥曰肃子”。<sup>[31]</sup>在《宋书》中，这种“因事附见”的编纂方法极为普遍，如《刘道规传》附带叙述刘遵履历，《庐陵王义真传》附带记载段宏履历，《何承天传》附带叙述谢元履历，《何尚之传》附带叙述孟凯履历，《谢灵运传》附带叙述荀雍、羊璿之、何长瑜三人履历等。因而，清代学者赵翼总结《宋书》这一编纂方法的优点时说：“其人不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sup>[32]</sup>由沈约开创的“因事附见”编纂方法，对后来史家的历史撰述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萧子显撰写《南齐书》便承继了这种编纂方法。

由于《宋书》有上述多方面的出色成就，使沈约赢得后代史家的高度评价。南朝梁时著名史学家姚察以独到的眼光，评价沈约“高才博洽，名亚迁董，俱属兴运，盖一代之英伟”，<sup>[33]</sup>即便以“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而著称的唐代史家刘知幾，亦盛赞沈约为难得之才，其文史成就足与班固媲美。<sup>①</sup>姚察与刘知幾深谙史学，他们对沈约的高度评价，不仅是对其历史著述成就的肯定，而且指出了沈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当然，不可否认，沈约的历史编纂又存在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宋书·符瑞志》等篇章中反复记载各类符瑞现象的产生，其最终目的是要宣扬“受命之符，天人之应”<sup>[34]</sup>的思想。这是其历史观中保守、落后的一面，我们在阅读《宋书》时应予以认真的辨别。

#### [参考文献]

[1][2][3][33] 姚思廉：《梁书》卷13《沈约传》、卷13《沈约传》、卷14《任昉传》、卷13《沈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33-234、233、253、244页。

[4][5][6][9][10][11][12][14][16][17][18][19][20][23][25][26][27][28][30][31][34] 沈约：《宋书》卷100《自序》、卷100《自序》、卷2《武帝本纪中》、卷52《褚叔度列传》、卷41《后妃·文帝路淑媛列传》、卷7《前废帝本纪》、卷54《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卷100《自序》、卷14《礼志一》、卷12《律历志中》、卷13《律历志下》、卷8《礼志五》、卷42《王弘传》、卷44《谢晦传》、卷94《恩幸传》、卷97《蛮夷·天竺迦毗黎国传》、卷95《索虏传》、卷95《索虏传》、卷79《文五王·武昌王浑传》、卷27《符瑞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7、2467、2467-2468、46-48、1503、1287、145-146、1540、2466、327、261-262、289、493、1318、1358、2303、2386-2387、2395、2324-2329、2042-2043、759页。

[7] 魏徵：《隋书》卷33《经籍志·史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5页。

[8] 苏晋仁：《〈宋书〉丛考》，《纪念陈垣诞辰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13] 朱绍侯：《沈约〈宋书〉评述》，《南都学坛》2001年第4期。

[1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0《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21] 郝懿行：《晋宋书故·宋书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8页。

[22] 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24] 陈清泉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8页。

[29] 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75页。

[32]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9《宋齐书带叙法》，王树民校证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4-185页。

责任编辑：郭秀文

---

①刘知幾在《史通》卷9《核才》篇言：“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在文学史上，班固以《两都》赋而闻名，沈约以《八咏》诗而传世；在史学史上，班固撰有《汉书》，沈约编纂《宋书》。显然，刘知幾意为，在中古之前以文史兼备而名家者，唯有班固与沈约。参见《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0页。

terly data. As a result, the paper states that, after long term adjustment, a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RMB is now closer to its reasonable level and undervaluation can be neglected.

### **On Coase's Theorem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Evaluat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roperty-Transaction Costs**

Zhou Yan 76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ase's theorem, analyzes the causes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ownturn since 1978 from two aspects, the former delinea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two stages from 1978 to 2008, since China found her own way to delineate and protect property rights, making the price mechanism to work, transaction costs consequently declined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won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it is a part of the reform measures in recent years that, contrary to property delineation and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makes the economic downturn occurred inevitably.

### **A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Li Peng 96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alysis from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drawing the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we can not only clearly find out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dealing with information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s channel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ut also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two different social cultural collision,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So, to some extent, modernity of the modern navigation channel charts of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is an applianc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Western science and modern cartographic mapping technology in China.

### **On Sima Qian's Multiple Dimensions View of History**

Chen Qitai 104

Made up of five different literary forms of recording biographic sketches of the emperors with memorials to them, th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life,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and the collected biographies, *Shiji* by Si Ma-qian is an organic historical work. This work is considered as a classic mainly because that with the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view, Si Maqian chronicled the historical events, gave prominence to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s' activities and showed the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complicated social life in the work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perspective, we could not only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ason that *Shiji*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model in writing Chinese history, but could also learn its history recorded in a multi-dimensional and more lively circumstances. Furthermore, it helps us to evaluate the deep influence that the historiography achievements that *Shiji* brought to the historians in the 20th century.

### **The Historiography Realm That Shen Yue Reached as the Second only to Sima Qian and Dong Hu in Ancient China**

Zhang Feng 113

Based on processors' work, Mr. ShenYue diligently completed a masterpiece, *Song Annals*, one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However, most critics pointed out that his means of a euphemism and covering up as shortages could hardly be regard as straightforwardness. In fact, Shen Yue intended to complete *Song Annals* as a veritable record by imitating Mr. Nan and Mr. Dong and following Mr. Sima Qian and Mr. Ban Gu. His *Eight Topographies* are the most import contribution. Succeeding to the great general-compiling spirit, he traced the origins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nd expounded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y intensive quotes and allusions, which made up the shortcoming of the history of Houhan dynasty and a record of three Kingdoms. Shen Yue showed his deep thoughts from the king's viewpoint into developing trend. He created new compiling ways: keeping one thing recorded with another related. He also revealed the style and feature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Liu's Song dynasty. For these compilation achievements, Shen Yue was recognized as the outstanding talent ranked second only to Sima Qian and Dong Hu.